

译文学

翻译研究新范型

王向远·著

归化·洋化·融化

译
与
翻

翻
译
度

选译·释译·创译

正译·误译·缺陷翻译

创造性叛逆·破坏性叛逆

可翻不可翻·可译不可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Press

译文学

翻译研究新范型

王向远·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译文学：翻译研究新范型 / 王向远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117-3628-4

I. ①译…

II. ①王…

III. ①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7796 号

译文学：翻译研究新范型

出 版 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邓 彤

责任印制：刘 慧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52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279 千字

印 张：14

版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5.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2017年11月在安徽师大讲“译文学”

王向远（1962—），作家、翻译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

发表论文260余篇；著作20余种，计600万字；译作18册，计360万字。著作结集《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2007年），论文结集《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全10卷（台北繁体字版，2017年）。

治学成果为“七史五论三学”。“七史”即《东方文学史通论》《东方文学译介研究史》《比较文学百年史》《日本文学汉译史》《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日本侵华文化文学史》，皆为填补空白的首部史著；“五论”即《日本右翼历史观驳论》《翻译文学导论》《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日美辞关联考论》，提出了一系列新见新论；“三学”即《宏观比较文学》《译文学》《中国的东方学》（上中下卷，即出），建构了三个学科范型与理论体系。

内容提要

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文化翻译”及“译介学”模式在我国长期流行，总体上一一直徘徊于翻译的“外部研究”而难以走进译文内部，除了“信达雅”“创造性叛逆”外，在“译文”批评中没有形成一套概念范畴，更没有形成理论模式或研究范型，要么是挑错式的批评，要么是笼统的印象批评，在多样性、丰富性、深刻性上，尚不能与一般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相比。

鉴于此，本书提出并论证了“译文学”的概念。作为学科概念，“译文学”是“译文之学”，指研究“译文”的学问，并与“译介学”相对而言；作为文学类型概念，“译文学”是“翻译文学”的缩略，并与“外国文学”“本土文学”相对而言。

本书从“翻”与“译”这对基础概念的发现与辨析入手，对中国传统译学关于“译文”的理论做了深入的挖掘与阐释，又充分借鉴了中外翻译学、比较文学及译介学的理论与观点，运用概念考论、语义辨析、体系建构的方法，创制了关于“译文学”的一整套概念作为学科范畴，提供了译文观照、译文研

读、译文评价的一系列角度与方法。其中，在“译文学本体论”层面上，提出并界定了“译”与“翻”、“可翻不可翻·可译不可译”、“迻译·释译·创译”三组概念，以此作为译文生成的概念；又提出并界定了“归化·洋化·融化”、“正译·误译·缺陷翻译”、“创造性叛逆·破坏性叛逆”三组概念，以此作为译文评价与译文研究的概念，而这两组概念又都指向“翻译度”这个核心概念。进而又在“译文学关联论”的层面上，阐述了“译文学”与一般翻译学、译文学与译介学、译文学与外国文学、译文学与比较文学、译文学与翻译文学史等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阐述了“译文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属性及独特的学术功能。最终在“译文学本体论”与“译文学关联论”两个层面上，完成了“译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形成了翻译研究的新范型。

本书融合了语言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化理论、美学等多种视域，展示了广阔的理论视野与研究前景，具有切实的实践操作功能。因此它既可以有效地作用于翻译研究特别是译文的评论与研究，同时，作为一种纯理论也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思辨价值与思想价值。

目 录

前 言 为什么提倡“译文学”	1
一、翻译研究中存在着三个问题	1
二、什么是“译文学”?	5
三、译文学模式对译本自性的强调	10

上编 “译文学” 本体论

第一章 “译文学” 的概念与体系	19
一、译文学关于译文生成的概念	20
二、译文学关于译文评价与译文研究的概念	27
三、译文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31
四、译文学与相关学科的关联	35
第二章 中国古代“翻”“译”之辨与译文学的元概念 ...	42
一、“传”“译”与“传译”	44
二、“翻”“译”之辨与“翻译”概念的提出	51

三、“翻·不翻·不可翻”及“翻译度”	58
第三章 “翻”的介入与“可译·不可译”之争的终结	71
一、“不可译”论者的“不可译”论	73
二、“可译·不可译”论者没有“翻”的概念自觉 ...	79
三、所谓“半可译”与“可译·不可译”的调和	84
第四章 翻译方法的概念——逐译·释译·创译	89
一、“直译·意译”方法论概念的缺陷	90
二、作为平移式翻译的“逐译”	97
三、作为解释性翻译的“释译”	104
四、作为创造性翻译的“创译”	111
第五章 译文质量评价的概念——正译·误译·缺陷翻译 ...	121
一、“信达雅”的译文质量批评只是印象性批评	122
二、正译·误译	127
三、介于正译与误译之间的“缺陷翻译”	131
第六章 译文文化学评价的概念——归化·洋化·融化 ...	136
一、“归化”的语源及对“异化”一词的质疑	137
二、从“归化·洋化”的对立走向调和	141
三、在“归化·洋化”的矛盾运动中走向“融化”	146

第七章 译者主体性评价的概念——创造性叛逆·破坏性叛逆	154
一、“叛逆派”的起源及其与“忠实派”的争点	155
二、“叛逆派”立论中的问题	160
三、“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	165
第八章 从译文学看“创造性叛逆”的原意、语境与适用性	172
一、“创造性叛逆”论的原意及对它的误解	173
二、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论的挪用、转换及其问题	182
三、“创造性叛逆”的适用性及其反思	188
第九章 从《古今和歌集》译案的选择看“翻译度” ...	193
一、“歌体”的翻译度与五七调三句译案的确立	194
二、“歌意”的翻译度与三种译案的比照分析	207
三、翻译度决定了翻译的优劣成败	234
第十章 从张我军译夏目漱石《文学论》看“翻译度”与译文老化	237
一、张译《文学论》的翻译度问题	238
二、张译《文学论》中的缺陷翻译、误译、漏译	251
三、张译《文学论》与译文老化问题	262

下编 “译文学” 关联论

第十一章 译文学与一般翻译学	271
一、“翻译学”与“翻译理论”	272
二、“翻译学”与“翻译研究”	278
三、“翻译学”与“译文学”	284
第十二章 译介学与译文学	290
一、“译介学”是中国人创制的独特的比较 文学概念	291
二、以“译介学”名义将翻译纳入比较文学 名正言顺	297
三、“译介学”的可能与不能	302
第十三章 译文学与比较文学	312
一、究竟有没有“比较的文学”这种“文学”？	313
二、要克服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化化”就必须 提倡译文学	319
三、国际文学关系史资源递减，译文学的资源 无穷无尽	324

第十四章 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332
一、原文与译文两种文本的混同	333
二、“评论”与“研究”两种模式的混同	340
三、两种混同形成的原因、弊病及其矫正	344
第十五章 译文学与中国翻译文学史	352
一、译文不在场的“翻译文学史”实为“文学 翻译史”	353
二、译介学立场上的“翻译文学史”实为“翻译 文化史”	360
三、译文在场，方能写成真正的“翻译文学史”	367
附录：“不易”并非“不容易”	
——对释道安“三不易”的误释及其辨正	373
一、所谓“五失本、三不易”	374
二、“五失本、三不易”的形成轨迹	377
三、对“五失本、三不易”的误释、误解及其辨正	389
本书各章初出一览表	403
王向远论文目录一览（1990—2017）	406
后记	430

前 言

为什么提倡“译文学”

一、翻译研究中存在着三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逐渐建立起来，许多大学的外文学院，都建立了相关翻译学的学科专业，翻译研究的文章和著作层出不穷，并且呈几何级数增长。但是，总体看来，由于我国翻译界此前没有经历过像西方翻译学那样的语言学派翻译学的浸润与洗礼，在翻译学科正要建立、翻译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紧接着又受到当代西方兴起的“文化翻译”思潮的冲击，在学科的突飞猛进的繁荣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最突出的问题有三：

一是全盘引进、照搬西方的翻译学流派，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推崇尊奉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当时的翻译界几乎是言必称奈达。而进入新世纪最近的十几年，则是“文化翻译”全盘进入，包括埃文-佐哈的将翻译置于语言、文学、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多角度加以研究的

“多元系统理论”、巴斯内特的将翻译视为“文化交际活动”及将翻译加以“文化转向”的主张，还有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使得翻译研究到处充斥着“政治、权利、权利话语、赞助人操控、意识形态干预、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创造性叛逆、归化/异化”等字眼儿。诚然，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使得翻译研究从语言学狭隘视阈，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这对于“翻译学”从语言学的学科束缚中解脱出来而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是有很大大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忽视甚至无视译文本身的研究，脱离译本的实际，拿“翻译”作由头，大谈文化问题的大而无当的虚泛弊病。久而久之，“翻译研究”便会被文化研究所淹没。

由此带来第二个弊端，由于“文化翻译”的虚泛的研究模式，对专业素养重视不够，而使得如今的翻译研究者可以在毫无翻译经验、毫无译作体验的情况下，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谈翻译。以前主要是翻译家和少数翻译理论家谈翻译，其他人不敢随便谈翻译，因为就“翻译”本身而言，对某一个译作做出批评与判断，就需要细读原文和译文，并且加以比较，然后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如今在“文化翻译”的语境内，哪怕没有读过原文，甚至不需要好好研读译文，只需要用浏览和抽样阅读的方式，就可以大谈翻译文化；以前是大量优秀的译作层出不穷，相反的，关于翻译研究的书籍文章只出自少数专家之手，数量极为有限，翻译实践多，翻译研究少，两者不成比例；而如今，优秀译作的比例在下降，而关于翻译论说方面的著作论文却成倍增长。翻译实践少，翻译研究多，两者也不成

比例。没有翻译经验与翻译体验，而要谈翻译，就势必会以照搬、套用西方的翻译理论为能事，有关介绍、推崇、评论西方翻译理论的文章，连篇累牍，选题严重重复、重叠，大同小异。除了少量之外，大都缺乏新意、没有创意。我在2008年度《中国比较文学年鉴》的绪论中曾说过：在翻译文学的具体研究中，有的文章援引西方理论而获得了新的论据与新的视角，也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文章，还处在对西方理论模式好奇地加以套用的水平上，就如同文艺理论界的一些作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做的那样。^①

第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年的翻译研究，就出现了避难就易、避重就轻的倾向。所谓“避难就易”的“难”，所谓“避重就轻”中的“重”，指的都是研读译本，并且将译文与原文对读，并在对读过程中，发现具体的问题。双文对读，作为研究性的阅读，是一件相当细致、相当需要观察力和判断力的工作。一切翻译的问题，都隐含在译文中，一切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文学问题、美学问题，都表现在译文的字里行间。在这一点上，传统的语言学的精英阅读的要求是不能丢弃的。作为翻译研究者，只有在对读译文的基础上，才能展开译文批评，并对译文做出不同角度的评价；作为翻译者，只有在译文对读的基础上，才能发现译文的缺陷，才能做出是否复译（重译）、能否复译的判断与决定，才能使得复译本，真正能够在旧译本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而这一切，在现在流行的“文化

^① 王向远：《2008年度中国比较文学概观》，见曹顺庆、王向远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翻译”的研究模式中，似乎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扎扎实实的批评与译文研究的缺乏，表现在近年来译文批评的文章，在大量的翻译研究文章中所占的比重极小，通过译文细读而写出来的好的译本批评文章更为罕见。像钱钟书的《论林纾的翻译》那样切中肯綮、卓有见地的翻译批评文章，简直就如凤毛麟角。在《翻译文学史》《文学翻译史》的撰写中，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地反映出来。照例说，关于翻译的文学史，作为文学史与一般历史著作的不同，就是要有大量的文本分析与文本批评，正如中国文学史书要有丰富的文本分析与文本批评一样。但近二十多年来出版的各种“中国翻译文学史”类的著作中，普遍缺乏对译本的观照与批评，存在着“译文学”意识严重缺乏、“译文不在场”的情况，往往把“翻译文学史”写成叙述翻译史的外部史实的“文学翻译史”，或写成强调翻译文学之文化功用的大而化之的“翻译文化史”，与理应建立在具体细致的译文批评基础上的真正的“翻译文学史”尚有相当的距离。我认为，“翻译文学史”不应写成“翻译文化史”。“翻译文学史”首先是“文学史”，其次是“翻译史”，最后才是“文化史”。“文化史”是它的外围的、背景的叙述。今后的“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书写，应该强化“译文学”意识，由翻译的外围走向核心、由翻译活动的周边走向翻译中心的译本，改变“译文不在场”的状况，把微观的“译文”文本的分析，与宏观的“文学”视域研究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写出真正的翻译文学史。

鉴于以上的分析，笔者提出了“译文学”的主张，并试图

以“译文学”的研究模式，矫正和解决上述的种种偏颇与问题。

二、什么是“译文学”？

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由研究者的不同的立场、方法，可以划分为“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不同的研究模式，也不妨看作是翻译研究的三派。

第一种研究模式是“翻译学”，是以跨语言的转换为中心的综合性翻译研究，包括翻译实践研究、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原理研究等。这一派在国内外历史悠久，积累较为丰厚，有传统的翻译学，也有对传统的翻译学加以批判继承的当代翻译学。传统的翻译学基本上是以原文、原作者为中心，以语言学特别是语言规范为依托，以翻译如何忠实于原作为基本问题。而当代翻译学则逐渐走向以译者为中心，强调翻译家的主体性，并从“语言翻译”的立场走向“文化翻译”的立场，重视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价值。

第二种研究模式是“译介学”，是谢天振先生在《译介学》一书及相关文章中提出并论证的一个概念。他指出：“译介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地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①可见，“译介学”虽然基本上脱胎于当代西方翻译学，但也形成了自

① 谢天振：《译介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己的研究话语和理论建构。它超越了语言学立场，从“比较文化”的立场出发，侧重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特别重视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强调“创造性叛逆”的重要价值，研究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文化理解的偏误，以及文化交融的功能。

第三种研究模式是“译文学”。照字面，对“译文学”可以有两个侧面的理解。一是从文学类型的角度理解，“译文学”是“翻译文学”的缩略，并与“外国文学”“本土文学”相对而言；二是从学科概念来理解，“译文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型，是“译文之学”的意思，指研究“译文”的学问，并与“译介学”相对而言，表明它由“译介学”的媒介的立场而转向“译文”，即翻译文本，亦即由“译介学”对媒介性的研究，转置于“译文”本身的研究。两个侧面的含义构成了“译文学”这个概念的完整内涵。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这三种研究模式之间，既有继承，也有疏离。“译文学”是从“翻译学”及比较文化中衍生出来的，“译文学”又是从“译介学”及比较文学中衍生出来的。“译文学”特别得益于“译介学”所界定、所常用的“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这一对概念，并把它们作为关键的概念范畴。尤其共鸣于“译介学”所提出的“译作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等重要命题。但与此同时，“译文学”和“译介学”也是有区别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译介学”主要立足于“比较文化”的立场，而“译文学”则主要立足于“比较文